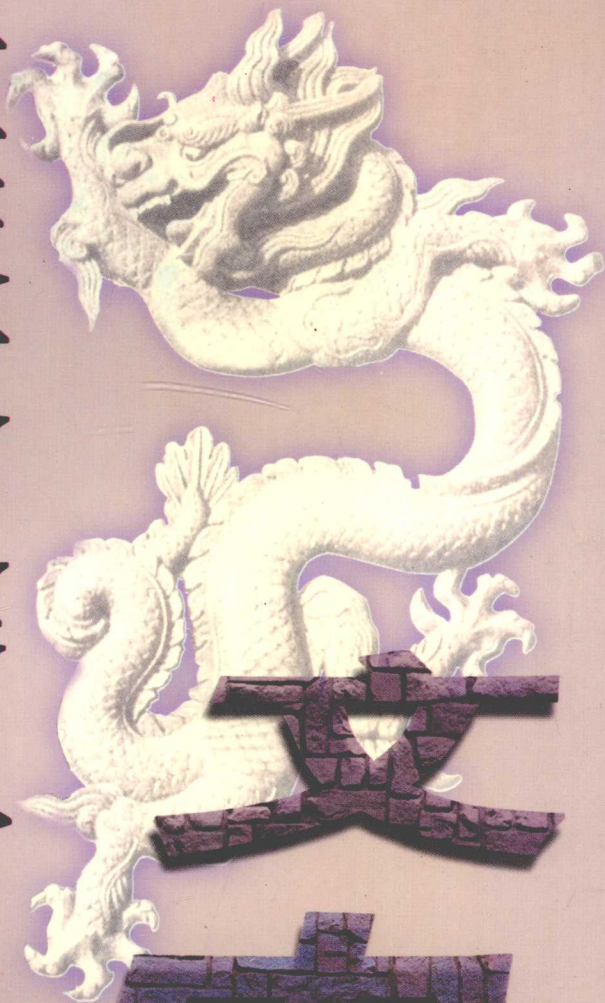


重庆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

第二辑

# 重庆文史资料



主 编 徐朝鉴  
副主编 周成锡 杨耀健  
责任编辑 郑 玲  
封面设计 徐赞兴  
技术设计 寇小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  
学习及文史委员会 编  
**重庆文史资料第二辑(总第四十六辑)**

---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建筑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38 千  
1999年1月第一版 1999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

ISBN 7-5366-4141-9/K·218

定价:10.00 元

# 目 录

## 风雨忆同舟

- 抗战时期国统区统战工作的回顾与体会 …………… 彭友今(1)
- 漫话重庆码头工 …………… 榭 山(26)
- 军统对重庆市警察局的控制概况 …………… 古 肱(37)
- 毛泽东主席视察隆昌气矿 …………… 刘学如(60)
- 周恩来总理视察丰都 …………… 殷汝南(66)
- 总书记关心四川油气田建设 …………… 刘学如(71)
- 真理的声音 …………… 孙锡昂(75)
- 接管重庆旧银行 …………… 邓林春(78)
- 改造国民党战犯 …………… 姜昭阳(83)
- 第三军医大学迁入重庆市高滩岩的前前后后 …………… 林 浓(109)
- 重庆工商界为抗美援朝出力 …………… 李建树(124)
- 梁平县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陈少承(129)
- 石柱县平息土匪暴乱纪略 …………… 周建华 向 超(137)
- 巫山猿人遗址发掘纪实 …………… 杜秋培(154)
- 夔门古象发掘记 …………… 魏小宁(168)
- 丰都历史上的抗洪救灾 …………… 殷汝南(172)
- 重庆集中营烈士资格审查经过概述 …………… 孙丹年(181)
- “一号专案”始末 …………… 孙 曙(188)

“四清”运动琐忆·····	於福海(200)
守卫“造反展览”·····	杨耀健(216)
侧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王孝询(222)
我的岳父范绍增·····	王继光(229)
冲破黑暗的文坛新星·····	李一民(235)
“中国恐龙之父”在北碚·····	曹幼枢(237)
名老中医周楚良·····	吴馥群 林克于(245)
一代宗师 武林奇人·····	朱 珠(253)
永川武术运动概况·····	邓永辉(261)
巴县的宗教活动概况·····	陈先觉 杨荣生(270)
“大隧道惨案”亲历记·····	曾婉清(279)
目睹还乡木船惨剧·····	陈未云(282)
韩国临时政府、韩国独立运动在重庆活动大事记·····	冯开文(284)

## 风雨忆同舟

——抗战时期国统区统战工作的回顾与体会

彭友今

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发动以抢占我华北，并吞全中国为目的的侵略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于7月8日通电全国，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生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国各界、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都纷纷表示决心，要坚定地团结起来，战胜疯狂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7月中旬以后，中共代表经过在西安、南京、庐山等地多次同国民党谈判，才取得了共识。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于7月15日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一文，其主要内容有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政治主张。23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宣言》的谈话，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双方都表示了合作抗日的意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从此，中华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全面抗日战争才算正式开始。

本文试就抗战时期，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领导下，我们在重庆从事统战工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经历

和体会。

## 一、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是抗战胜利的基础。

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并根据《纲领》有关规定成立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的诞生，虽然姗姗来迟，但这也是实现国内团结，共赴国难的重要举措，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推动下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政治窗口。但是，国民参政会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意机关，实际上只是一个民意发言机关，是一个国民党的咨询性质的机关。尽管它不尽如人意，但为当时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团结的进展，为促进全国各种政治力量的接触提供了一个场所，也是民主政治的开端，因而吸引了各党各派。

第一届参政会200多名参政员中包括各党派代表人物，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宋庆龄、何香凝等也被遴选为参政员。参政员的产生，不是正式民选而是由国民政府“邀请”参加。代表是以地区和经济文化团体的名义出现的，而不是以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和团体的名义出现的。这就为日后争夺控制权埋下了伏笔。在被“邀请”的代表中，中共有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林祖涵、邓颖超等人；国社党有张君勱、罗隆基（后退出该党）、胡石青、徐傅霖、梁实秋等人；青年党有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陈启天、常乃德等；第三党有章伯钧；救国会派有沈钧儒、陶行知、王造时、史良、张申府、邹韬奋；职教社派（指中华职教社以及和该社接近的诸先生）有黄炎培、江恒源及冷御秋等；乡建派有梁漱溟；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有东北地区的莫德惠、杜重远、王家楨、王卓然等；还有所谓教授派，即十几位大学教授，（他们平日交往密切，对政治多少有些共同兴趣，会议期间他们每有小组聚会，交换

意见，在提案中互为声援，形成教授派的力量。)这一派中有罗隆基、罗文干、陶孟和、周炳琳、傅斯年、张奚若、杨振声、钱端升、任鸿隽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左、中、右派都有，以中间派占多数。他们大多拥护国共合作，赞成团结、抗战、民主。他们的政治倾向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纲领要求相一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合作关系。

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通过的宣言宣布：“中华民族必以坚忍不屈的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最后胜利之目的为止。”号召“各党各派亦存小异而趋大同，翊赞统一，共同救国”，“在政治上须本抗战建国纲领，力求庶政之革新，树立政治之基础，以及抗战时期保障民生”的内容。

总之，初期的国民参政会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战时民意机关的作用，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对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妥协投降，发挥了积极作用。因而它不仅为当时国内、国外所瞩目，而且获得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支持和拥护。全国各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发表了谈话，都表示要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大会召开时，毛泽东致电参政会，勉励以坚持抗战，中共七参政员也发表了对国事的意见。宋庆龄、郭沫若等恳切陈词，表示了热切的希望。代表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沈钧儒、黄炎培、张澜、史良、梁漱溟、晏阳初、杜重远、王卓然、章伯钧、罗隆基等，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谈话，祝愿国民参政会成功。参政会外的各党派、各团体和各方面人士，则议论纷纷，寄希望于大会。一些国际援华组织、华侨团体致电大会表示祝贺。这是国民参政会初期的盛况，也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高潮和鼎盛时期。

抗战前，国民党内就存在亲日派和顽固派势力。抗战以来，这股亲日妥协派势力，淹没在抗日战争的高潮中不敢抬头。广州失

守、武汉撤退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策略，放松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军事进攻，转为政治诱降为主。这也是当时国际上的一股逆流，英美准备与日妥协，暗中对中日战争进行“调停”，日寇汉奸就乘机造谣，说中国会发生分裂，要走上妥协投降的道路。同时国民党内亲日派分子也起而活动，散布抗战必败，再战必亡的谬论。

及自国民参政会迁到重庆之后，妥协投降派的论调更加甚嚣尘上。在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前后，汪精卫就连续对海通社、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大放厥词，制造投降论。他鼓吹中日“和平”只是迟早而已，表示“吾人愿随时和平”，说假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他可接受为讨论之基础等等。此时外电盛传汪精卫正与日本议和，蒋介石即将辞职等等，实际上汪精卫之流早就与日寇私通款曲，只不过是讨价还价。国民党顽固派虽尚能继续抗战，但妥协倾向严重存在；只是没有或不敢公开声张。同时，国民党报纸上的“和平”议论连篇累牍，骤然剧增，还有些人对抗战失去信心，悲观失望。一时间，国民政府所在的陪都重庆笼罩在妥协投降的乌烟瘴气之中。

值此关头，抗战大业和统一战线面临严峻的考验。大敌当前，迫切需要国共合作。我们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揭露投降派破坏团结的罪行、团结争取国民党内的抗战派、各民主党派及一切爱国力量。当时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广、汉失守后给各级党部的指示》中，指示各级党组织：“反对一切和平妥协活动”，“克服动摇和悲观失望的情绪”，“诚心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巩固国共合作，坚持抗战。”明确要求对国民党人要区别对待，既要坚决反对妥协投降的亲日派，又要拥护坚持抗战的国民政府。这就是当时我们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中共参政员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都赶到重庆，出席了10月28日召



开的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会议开幕之日，毛泽东致电汪精卫，指出：“全国抗战进入最严重新阶段的时候，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特别是要坚持举国上下精诚团结之民族统一战线。”告诫汪精卫不要破坏团结和抗战。中共六参政员则在参政会上提出了《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强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痛斥妥协投降的无耻谰言。这一提案引起了强烈反响，有 67 人联署，创造了国民参政会历史上提案联署人数的最高纪录。陈绍禹、吴玉章、林祖涵还分别提出了克服艰难度过难关、推动欧美制裁日本、严惩汉奸和民族叛徒的提案。

各党各派的参政员都呼吁加强团结，反对妥协投降。爱国老人张一麟、民主党的王造时、重庆抗敌后援会主席胡景伊等分别提出《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反对议和》的提案，并要求国民政府发表抗战到底宣言。特别是华侨参政员陈嘉庚从新加坡发来一份电报，“官吏言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的 11 字提案，言辞犀利，痛快淋漓，直斥妥协投降分子要害，在会上反映和影响最大。许多人参加提案联署，旅居海外的华侨也致电参政会，“抗战始足图存，同侨誓死拥护”。而汪精卫竟然不顾廉耻和舆论谴责，唆使其党羽反对这些提案，还企图掀起“和战”问题讨论。一些投降派的无耻之徒，竟公然反对和篡改陈嘉庚的来电提案，大吵大闹。但大会仍通过决议，号召“全国国民在蒋委员长领导下，坚决抗战，决不屈服，共守弗渝”。提案和决议案一扫投降派制造的乌烟瘴气，全国军民为之振奋。最后，一届二次参政会通过了基本国策的议案。这是抗战以来极为重要和关键性的一场斗争，这场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

一届二次参政会闭幕不到 50 天，身为议长的汪精卫即公开叛国投敌，充当了汉奸。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国民党营垒发生了分裂。汪精卫之类的公开叛国，遭到中共、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的一致斥责。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严厉指出，汪精卫“背党叛国，通敌求和，违反国策，惑乱人心，固革命政党所不容，亦全国人民所

共弃”。并进一步提出：“自兹以后，凡属言论行动表现妥协动摇倾向之分子应随时揭发，严加制裁。”第三党于1939年1月发表《声讨汪兆铭通敌日本》的电文，严加斥责汪精卫的叛国罪行，要求“通缉汪兆铭，归案严办”，并对其党羽“撤查缉办，以期除恶务尽”。

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四次大会上，为了穷追不舍，除恶务尽，参政员都要求继续揭露汪精卫叛国阴谋，要求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汪逆归案法办的决议。在一届三次会议上，中共参政员林祖涵等提出了《拥护蒋委员长严斥近卫声明并以此作为今后抗战国策之唯一标准案》。一届四次会前前夕，中共七位参政员又向大会提出，中国政治方面第一项任务就是“动员全国力量反对妥协投降分子”。董必武等在会上提出《拥护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声讨汪逆，肃清汪派活动，以巩固团结，争取最后胜利案》。救国会的参政员邹韬奋、无党派参政员郭英夫、王卓然等也分别提出议案，要求参政会通电讨汪。一届三、四、五次会分别通过了《拥护政府抗战国策议案》、《声讨汪逆兆铭南京伪组织案》，重申抗战到底的既定方针。

在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上，各党派人士要求国民参政会坚决深入揭露其叛逆罪行。正式提请政府明令《通缉汪逆案》，由于受到暗藏的亲日派阻挠，直到汪精卫叛逃了10个月后，才由国民党中常会以“违反纪律、危害党国”的罪名，开除了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撤销其国民参政会议长的职务，足见亲日派在国民党内势力影响之深。

全国各地的许多城市都召开了不同形式的讨汪大会，揭露汪逆叛国投敌和自绝于中华民族的反动实质，批判这些民族叛徒的投降求和的反动理论，并掀起一个广泛的坚持抗战到底的群众运动。全国民众愤怒声讨，各大城市的120多家报纸口诛笔伐。重庆各界的爱国人民团体纷纷行动起来，在“三八”纪念大会和示威游行活动中，有一万多名妇女参加，并发动多个妇女团体参加反汪

签名运动。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以及许多县城，都先后召开锄奸讨汪大会或通电讨汪，使反汪运动深入人心，深入穷乡僻壤。延安各界召开讨汪大会，全场群情激愤，一致声讨汪精卫的卖国投敌罪行，拥护抗战到底。

持续了一年多的全民性的反汪运动，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信心，稳定了政局，稳定了人心，提高了全国军民团结抗战和民主进步的政治觉悟。使坚持抗战、坚持抗战到底，成为全民共同意志，沉重地打击了亲日派和投降派。

## 二、坚持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是抗战胜利的保证。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日本对国民党由军事打击为主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日军作战的主攻方向也从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转向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这种改变，面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国民党也随之由对外转向对内，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就是这种政策转变的标志。在这次全会上，国民党提出了“溶共”、“防共”、“反共”的政策，准备同室操戈。

国民党顽固派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恶毒攻击和诬蔑共产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员、爱国志士和进步青年。另一方面在军事上不断制造分裂，多次挑起反共武装摩擦事件。从1939年4月开始，国民党军相继在山东博山伏击八路军山东纵队，在冀中深县袭击八路军后方机关，在湖南平江残杀新四军干部，在确山围攻新四军留守处。从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后，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武装摩擦不断升级，达到一个高峰，形成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军主要集中进攻晋西地区、陕甘宁边区、晋东南太行区，矛头指向八路军总部，其中尤以1939年12月国民党军制

造的“晋西事变”最为激烈。根据党中央“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的原则，根据地军民奋起自卫，击退了国民党军的三路进攻。在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人民武装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停止了对国民党军的追击，接着进行谈判，达成了停战协议和分区抗战的协议，抑止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变”，围歼奉令北移的新四军部队 9000 余人，扣押军长叶挺，枪杀副军长项英等多人。在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上，国民党顽固派又公开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气焰嚣张，来势凶猛，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在军事上采取守势，在政治上开展攻势。一方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使之公诸于众；另一方面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参政会以示抗议，并提出“十二条”作为出席会议的条件。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扩大政治影响，而且表明我党力求恢复团结抗战的立场，博得国内外同情。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及其所有工作人员，广泛地向国民党抗战派、元老派、各民主党派及文化界、外交界和新闻界人士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周恩来亲自领导南方局和《新华日报》，揭露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的暴行和发动军事进攻的真相，并以极其愤慨的心情，亲笔为《新华日报》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悼词和挽诗，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向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控诉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罪行。

这时蒋介石为了缓和舆论压力，极力要求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周恩来从顾全大局出发，指示中共在渝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发表公开信，提出停止内战、承认中共及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等“后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这样，就使国民党更加处于被抨击被指责的境地。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以

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在这次斗争中运用得淋漓尽致。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迫使蒋介石作出让步，不得不在参政会上保证“以后再亦无剿共的军事”，使局势得到缓和。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军事进攻开始，而以政治失败告终。

中国共产党的正义立场，得到各阶层民众、各民主党派、国民党内进步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特别是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先后致信蒋介石和致电国民党政府，反对当局在皖南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军长。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也对蒋介石、何应钦的举措表示不满，忧虑国内前途。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国民党顽固派炮制的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表示极为愤慨。当时陈嘉庚正率领中华侨胞慰问团访问延安，他代表100万侨胞通电全国，呼吁“制止内战，加强团结”。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邵力子致电蒋介石，告以国际舆论的谴责，晓以利害。大批文化名人、科学家、实业家、各人民团体、新闻工作者也一致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的阴谋活动。甚至在国民党高级官员中，“文人多主张缓和”，连国民党内某些高级领导人也不赞成军事反共。

“皖南事变”也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响。1941年7月罗斯福给蒋介石写信，表示国共两党相同之点多于相异之点，故“希望双方消除歧见，更密切合作，俾有利于对日作战的共同目标”。苏、美、英等国对国民党制造的反共事件，纷纷表示反对或不满。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拒不出席国民党驻苏大使原定举行的宴会。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见蒋介石时还明确表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内战对中国意味着灭亡。美国总统代表居里访华时会见周恩来，并对蒋介石正式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并批评了国民党的对内政策。英国政府表示中国内战只会加强日军进攻。此时此刻国民党顽固派处于各方舆论谴责中。

仅仅半月前还是不可一世的蒋介石，顿时陷入了空前孤立和

被动的窘境，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不能不有所收敛。毛泽东说：“蒋介石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皖南事变”前，国民党顽固派是进攻，中共是防御的，“皖南事变”后反过来了，国民党顽固派处于防御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最大收获就在于此。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诬蔑中共领导的军队是“军阀”，抗日根据地是“封建割据”，声称这是今后“中国之命运”要解决的主题。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国民党顽固派利用这个时机，再次掀起反共高潮。他们叫嚷要“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妄图从政治思想上动摇中国共产党。同时先后调集20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并作了几十次试探性挑衅进攻，力图以军事压迫逼中共就范。由于中共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公开揭露了他们的阴谋，而南方局则配合边区的自卫斗争，在国统区发动了卓有成效的政治攻势，争取了国内外各方面力量的声援和支持，有效地挫败了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不得不声明要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国共关系再次趋向缓和。

在此情况下，中共南方局的领导周恩来把群众工作的中心，放在利用所能利用的社会关系、社会习惯、政府法令和合法组织方面，同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一道，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组织文化艺术工作者，广泛运用话剧、诗歌、音乐会、书画展等表现形式，用历史的借鉴、社会的借鉴，宣传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大批文化名人、民主战士为抗日而奋斗不息；为救亡而努力不懈；为国共团结，反对分裂而战斗不止。郭沫若在重庆创作的话剧《屈原》，演的是历史，实际上是借屈原的爱国之情鞭挞现实的黑暗世界，骂的是古人，但影射的却是国民党顽固派。还有他的《孔雀胆》、《虎符》和《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等等，都发挥了极大的战斗作用。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借太平天国内部自

相残杀的史实题材，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屠杀新四军将士的罪行。还有茅盾主编的《文艺春秋》、夏衍创作的话剧《法西斯细菌》等大量的作品和演出，轰动了沉闷的山城，鼓舞了广大民众的斗志。

周恩来亲自做知识分子的工作，经常同郭沫若、陶行知、马寅初、洪深、翦伯赞、侯外庐、邓初民、沈志远等接触谈心。在政局恶化的情况下，他还利用各种形式谈抗战，谈团结、谈民主，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诡计。当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抨击四大家族而被捕入狱时，周恩来和南方局则在重庆发起遥祝马寅初60寿辰的活动，并联名致送寿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表达了中共对坚持进步立场、为人民勤奋工作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尊敬和赞扬。

### 三、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实现民主政体而斗争。

为了争取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坚持进步的立场，反对任何倒退活动，对一切不利于抗战的思想、制度和办法都要求予以切实改进。

#### （一）从宪政运动到提出建立联合政府

民主是历史的潮流，是抗战的需要。宪政运动，即是争取制定宪法，实现民主政治。把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力，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

为达此目标，中共参政员和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员在一届一次大会和一届二次大会上都提出了“加强党派团结”、“维护“各党派合法地位”、“保障人民权利和言论出版自由”等建议或提案，但遭到国民党参政员的阻挠，未予置理。到一届三次大会，许多参政员再次提出民主改革，要求加强民权主义，结束党治，实施宪政的提案

和建议。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武汉大学教授周览和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领衔提出的两个提案。周览等提出确立民主法制以奠定建国基础，指出：政府的体制应民主化，要根本改革政体，抨击国民党十多年来没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认为如不再增加民众的参政权力，“势必造成一个极权国家”。董必武等的提案，批评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最主要的缺点是“民权主义未能切实地实施”，并提出：“各党派之间的团结，既承认其存在，但还是没有予以法律保障，以至摩擦时生，莫由解决。”因此要求“政府应给各党派以法律上的保障”。中国共产党认为“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这是抗日时期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

这两个提案震动了大会，也震动了整个舆论界。蒋介石对这两个提案极为不满，断然拒绝改革政体、改组政府的要求。但这些提案却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将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推向前进。

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不仅遭到中共的坚决反对，也引起了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的不满，逐渐与国民党产生疏远与对立，纷纷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这样，一个推动民主宪政的运动在国统区兴起了。在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前夕。毛泽东等中共七参政员发表了《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明确提出解决抗战危机的全面提案，在政治方面的五大任务的中心目的，是实现战时民主，保障人民权利，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权利。民主党派代表张君勱、左舜生、章伯钧等人联名提出了《结束党治，立施宪政》的重要提案。在会前协商酝酿的基础上，共产党、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社的参政员相继提出了实行政治民主，改革现行政府的六个提案。国民党参政员也提出一个提案，这七个提案成了大会的主题。

中共要求政府解决影响国共关系和统一战线的迫切问题，“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代表中间势力的各党派，普遍强烈



要求“结束党治，立施宪政”，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其中国社党提出成立“战时行政院，以求全国行政之全盘改革”。青年党甚至要求政府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赋予国民参政会以“制宪”之权，连行政院都应对它负责。代表顽固势力的国民党，则表现虚与应付，消极被动。经过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参政员据理力争，采用“扩大会议”的办法，使全体参政员均可参加讨论，经过激烈的斗争，勉强通过并形成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并“交政府切实执行”。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这不失为参政会上的一大收获。但是蒋介石竟拒绝了政治改革，改组政府的要求。这是国民党政府失信于民的集中表现。

人们深深懂得，民主政治不可能靠国民党参政会和国民政府的决议而轻易取得，必须动员全国民众来推进宪政运动。中共、民主党派和爱国民民主人士吴玉章、董必武、秦邦宪、沈钧儒、黄炎培、张澜、褚辅成、章伯钧、张申府等，在重庆发起宪政座谈会。中共和民主党派参政员一起参加和领导了宪政座谈会。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地也纷纷组织民主宪政实施协会等群众团体，利用集体和报刊讨论宪政，抨击国民党的专制，要求民主自由，主张开放政权，实施宪政。

1939年底，中共参政员秦邦宪、董必武与民主党派的参政员沈钧儒、张申府等在重庆召开宪政促进会筹备会，参加的有孔庚、邹韬奋、章乃器、钱俊瑞、史良等50余人。会议推定孔庚、张申府、董必武、秦邦宪、刘清扬、章乃器、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25人为常务委员，组成宪政促进会常委会。宪政促进会的成立，无论在国民参政会的会内和会外，都使宪政运动成为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运动。各地的宪政座谈会、宪政促进会纷纷发表关于实施宪政的主张，在报刊上刊载有关宪政问题的论文，宪政运动遂在全国兴起，迈出了前进步伐。在各地展开的宪政运动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走在全国的前列。1939年11月，毛泽东、吴玉章等